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世界的茉莉

Jasmine Blossoms for the World

doi:10.6752/JCS.201006_(11).0015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 : 朱元鴻(Yuan-Horng Chu)

頁數/Page : 236-24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評論

《文化研究》第十一期（2010年秋季）：236-249

世界的茉莉

Jasmine Blossoms for the World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哲學家迄今以各種方式解釋了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如何改變她。

馬克思(Karl Marx)〈費爾巴哈論綱〉(Theses on Feuerbach, 1845)第11條這麼說。但反過來說可能也有意思：

變革遲早會發生，重要的是如何感覺、詮釋她。

一、旁觀者的熱情

此刻，中國的茉莉花行動持續著，我們也持續讀到「中國不是阿拉伯世界」之類安撫或譴責的評論。伊札特(Yizhate)，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社長，在一篇〈我愛茉莉花〉的博客評論表示他理解茉莉花在中國與在阿拉伯世界同樣是潔白美好的化身，深受人們喜愛，但是他遺憾茉莉花被賦予了過多的政治意涵。據他說，阿拉伯人十分反感把突尼西亞(Tunisia)人民的革命稱為「茉莉花革命」，因為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1987年推翻前總統哈比·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的政變就被稱為「茉莉花革命」，那已成了個諷刺；他認為把北非「綻放」的茉莉花移植到中國的想法讓人貽笑大方，說那是「拿來主義」、「山寨文化」，說「革命輸出」這種不切實際的構想注定失敗。¹

1 謝謝汪暉捎來這篇博客文字：<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52547#10198844>。「革命輸出」包括了人員的意識型態灌輸、武裝鬥爭

不過，2011年春天的茉莉情事，當然不能這般簡單地看作僅僅是阿拉伯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拿來」或「山寨」關係。任何進入世界歷史的事件，其意義與熱情的感染都必然超乎了原來發生的場址，其理念內蘊的流變演化也不再是任何一方權威可能制裁或定價的。1776年的美國獨立革命，1789年推翻君主專政的法國革命，其餘緒迄今仍在。1871年短暫兩個多月的「巴黎公社」迄今依然是「無產階級專政」號召的濫觴，儘管許多史家指出那是透過馬克思與列寧(Vladimir Lenin)著作而形成的神話。1917年俄國革命立即燃起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激勵了整個世代的革命事業，直到今日中國政權仍宣稱延續著這個革命傳統。1966-197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當時與世界許多角落有著共振，至今仍可在歐洲知識圈找到不少忠實信徒。即便是海地革命(1791-1804)，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下經過漫長慘烈的鬥爭，脫離法屬殖民統治建立了世界第一個非裔人民的共和國，也在其後的半個世紀深深影響了英屬、法屬殖民地的廢奴過程以及美國的黑奴解放運動，這弧帶著種族感受的漣漪直到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仍見到有其感染世界的熱情。1911年建立第一個亞洲共和國的辛亥革命，在今日中國還聽到「第一共和的魅力」，不能說是已無波瀾。而1989年由天安門廣場的熱情而序幕的東歐蘇聯解體浪潮，只有完全屈從於冷戰觀點，才會淺薄地認為那是西方的勝利（無論是慶賀或是痛惡），而如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遺憾的：看不到那是個東歐蘇聯人民努力十幾年而終於獲致成功的社會革命。所有這些時點，這些仍然活著的事件，譜出了我們持續蕩漾的「當代」。2011年春天的茉莉情事，不是阿拉伯季風單向吹皺了無波的中國，而是世界歷史的最新一股湍流，再一次攪起了原本就凌亂的波漣，其幅距是世界的。

1798年，面對著持續動亂的法國大革命，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問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們，旁觀者，目睹著一個精神洋溢的鄰近民族發生的革命，為什麼會感到熱情？我們不是參局者，沒有

的訓練以及武器的輸出，這詞彙中國使用得最普遍。茉莉花革命顯然與這個中國熟悉的模式無關，而是與世界有著共振關係。

捲入利害衝突或攸關生死的鬥爭行動，所感到的熱情是什麼？在經驗的層次，我們看到的是渾沌不明的情勢，盲目的偶然，悲慘與暴行的堆積，無從確知革命將會成功或是流產。我們無法從革命過程的立即經驗確認什麼人類進步的意義。革命作為一個事件，並非實證知識可以確認理解的對象，而僅僅是作為歷史的徵候(*signum historicum*)，感應著我們的某種理念，因而令我們有著強烈的感覺——熱情。例如康德在眼前的法國大革命看到：人民能夠自由而不訴諸武力地為自己的政治生活立憲。這麼一個事件，一旦發生了，再也不會遭到遺忘，此即歷史的進步意義。²

2011年北非與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同樣有著打開世界眼界的熱情感染力。首先粉碎的是以「文明衝突論」夾帶種族偏見的政治刻板認識：阿拉伯或穆斯林似乎沒有自由與民主的政治能力，只會受到原教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動員，只能在世俗獨裁統治或狂熱的神權統治之間擺盪。錯了！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看到的一點兒也不是原教旨主義的表現，而道地是個世俗的民主革命。由失業、物價、貪腐、警察凌辱而點燃的集體行動，成為要求自由、終結獨裁與威權政府的民主革命。突尼西亞起事的導火線是26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的果菜攤推車一再遭當局強制沒收，當他上訪投訴時又遭到警方變本加厲的凌辱，終至憤極自焚而死，引爆了積累已久感同身受的廣大民怨。在缺乏法治與官僚責任的威權體制，這類對一般民衆的尊嚴與權利毫無尊重的問題始終不絕，加上腐化與特權家庭的昭彰對比，無分西方東方文化，無分種族與宗教，都同樣招致民怨。

3月19日埃及舉行現代史上頭一次人民自由參與的修憲公投以7成7的高支持率通過，確立了六個月後的總統與國會大選。這不僅是埃

2 Immanuel Kant,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the Human Race Constantly Progressing?," in *Kant O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85[1798]). See also Jean-François Lyotard, *Enthusiasm: The Kantian Critique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G. van den Abbee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及國內的大事，也對中東與非洲國家具有區域的以及國際的影響。兩百多年前令康德感到熱情的歷史徵候——人民能夠自由而不訴諸武力地為自己的政治生活立憲——今日仍令世界感到熱情，因為人們進一步認識這個歷史徵候，無分東方西方文化，無分種族與宗教。

二、群龍無首，吉

《易經》「乾卦」裡「用九」的卦辭，「見群龍無首，吉」，被認為是最不可思議的卦辭。在一般成語使用裡，群龍無首，通常用來指沒有領頭人的狀況，是亂局或凶象。家家有家長、國有國君、軍隊有將帥、鄉里有頭人、公司有老闆，革命要由黨領導、大海航行靠舵手，每個團體都該有領導人，似乎才能夠統一行動、穩定運作、正常前進。在一個上下有序、習慣領導與被領導的社會裡，群龍無首的想像無非是混亂失序、瓦解渙散，如何能成為吉卦？2011的阿拉伯之春卻讓我們有所領悟，或許可以為這費解的卦辭作個當代的喻解。

2011埃及的革命主體是啥？借用阿明(Samir Amin)的分析，參與者可以解析為四個組成部分：³

- 一、年輕人 / 青年
- 二、共產黨傳統的左派
- 三、資產階級民主派
- 四、穆斯林兄弟會

阿明說得很清楚，第二三四部分都僅是相繼跟上、配合，不是主力。主力在「年輕人」，一個妙不可喻的籠統指稱：沒有清楚標示的階級屬性、沒有意識型態左右的屬性，沒有宗教派別屬性，想將他們套入反資本主義概念或政黨的框架都不方便。但他們在社交網絡與通訊上是技術靈光的，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數小時之內有動員百萬人乃

3 Samir Amin、汪暉、劉健芝，〈埃及的運動：對話薩米爾·阿明〉，《文化研究月報》第113期(2011/02/25)。引自：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Content.asp?Period=113&JC_ID=313。

至千萬人的能力。短短數週之內，這個難以捉摸的革命主體實現了埃及的變天，卻沒有為我們創造出受人崇拜的英雄，沒有毛澤東、沒有卡斯楚(Fidel Castro)、沒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也沒有為我們留下繼續領導人民數十年、獨家豐功偉業的革命政黨。

不得不佩服萊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的先見，他2003年的書名已經宣告*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聰明結夥：下一個社會革命）。當然，他已經目睹了2001年馬尼拉年輕人透過手機簡訊的結夥，以人民力量推翻艾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總統的事件。2009年6月伊朗抗爭事件爆發之後，蘇利文(Andrew Sullivan)一篇報導標題宣告「The Revolution Will be Twittered!」聰明結夥，是群龍無首的行動主體，人們不需要彼此認識，卻能夠運用互聯網、電腦與手機的傳播能力，以之前不可能的方式協同行動，其幅距可以是世界的，但最重要的還是在地的抗爭。

我們今日更能夠領會「第二媒介時代」的說法。⁴第一媒介時代的特徵是中央化或寡頭製作訊息內容，大眾接收，包括了報紙、電影、廣播、電視；反向回饋要麼不存在、要麼是極微窄的象徵性點綴，例如電視或廣播的call in，報紙的讀者投書。第二媒介時代的特徵則是訊息的製作與接收不再有遙遠不對稱的位階，不再有製作發送的中央。製作者、發送者與接收者可以輕易互換，也沒有固定位置。其科技原型是電話，當前的典型是互聯網、社交網絡。在第一媒介時代的革命運動，不經過奪取報紙、電影、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控制權是不可能的，但在第二媒介時代，科技聰明的「年輕人」可以略過那些主流媒體而創造大規模協同行動的事件。隨著21世紀出現的是群龍無首的媒介科技模式，呼應相生的是群龍無首的民主運動模式。

當然，不能低估當權體制收編控制新媒介的能力。20世紀20-30年代許多最初具有解放性的新媒介，包括電影，都立刻成為當權體制最關愛的宣傳工具。對於互聯網的收編、檢查封鎖、滲透宣傳、關鍵時刻封網斷訊，必然是故事裡的情節。但任何一方若誤以為「網民」

4 Mark Poster, *The Second Media Age*(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是鬥爭的主體那就錯了。火苗不在網路裡。果菜攤販布瓦吉吉不是網民，他在街頭自焚。而埃及當局關鍵時刻封網斷訊，反而驅使年輕人湧向街頭。網路與街頭廣場是互為延伸的。

三、茉莉，黑手，老譜

2011的阿拉伯之春，跟大多數革命事件一樣，來得突然。這是它跟有著花期的茉莉最不同之處。記得1989年11月起燃的東歐革命波濤最終導致蘇聯崩解(1991)，冷戰對手美國培養的三千多位蘇聯東歐研究專家竟然沒有一位預見。突然降臨的事件令人們瞠目，尤其是政治人物不知所措，搞不清狀況的胡語，隨後便成為舉世的笑柄。法國前外交部長阿利奧－馬里(Michèle Alliot-Marie)公開表示遺憾未能提供法國的鎮暴警察技術及時援助本·阿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表示埃及的情況「*must be managed*」以免傷害解決以巴長期紛爭的努力，說得就像是北非發生的革命也在西方「管理」的項目之中。這兩則評論不僅有博人笑話的荒謬喜感，也透露了這次北非被人民推翻的獨裁者曾經是西方政治人物熟悉的交涉伙伴，甚至被當作中東秩序與穩定的基石。

很明白，長久以來美國與西方對於阿拉伯人民自由民主的關切遠不及「與我同路」的現實政治來得優先，迄今仍然表現在美國對待中東人民抗爭有著雙重標準的尷尬。但是「與我同路」優先的現實政治，舉世皆然，美國並非獨惡。中國在非洲與亞洲選擇的朋友，辛巴威、蘇丹、緬甸、北韓……，不乏兇殘的獨裁者，比起仍需偽善考慮人權的西方國家，「與我同路」的現實政治不是優先而是絕對。台灣也一樣，過去20年間交好擁抱過的獨裁者，可以開個攝影展，號稱自由民主的輿論，何時質疑過珍貴「邦交」的優先性？

美國與西方在應付一個他們未曾預料的突發變局，他們回應的動作或許尷尬與偽善皆有，毫無疑問他們仍將是中東霸權棋局的參

局者，雖然可能有些會是輸家。⁵但畢竟他們對弈的棋盤是變動的世界，相較之下中國當局主導的國內輿論卻將這回中東突發的變局又擺出了中國與美帝對弈的棋盤。慣性地指著西方以美國為首的戰略黑手，如果這條說不通（為何他們要自毀其中東秩序的戰略基石呢？）那麼必然是美帝的兩手戰略：讓世界亂一下，特別是搞亂新興大國（還有哪國？），是他們想賭的另一手牌。於是，防衛茉莉花又接上了數十年來熟悉的反和平演變戰略棋譜。常聽說中國的獨特性在其黨國的獨立性格，我想笑問：黨國的不安全感能不靠這盤老棋譜來解說麼？碰著什麼就唱起「攞係你啦！害我……」很難給人獨立的尊嚴感。若撇下這盤棋，不靠虛擬的反華陰謀譜，黨國還能站著盱衡世界變局嗎？我引一句《環球時報》評論茉莉花的結語：

作為中國人，我們自己清醒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國家越大，社會越穩定，西方搞亂我們的幻想就越受到壓制，與我們合作就越積極，一些本可能實施的反華計畫，也就成了廢案。⁶

過去十多年來，西方對中國人權與民主的要求相對愈少，期許中國加入擔負世界秩序的邀請愈多。我很難置信在埃及變天之後黨營《環球時報》的評論仍毫無覺察：其結語所冀望的位置，正好就是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位置。就算與西方合作日趨密切，充分扮演世界秩序的維穩角色，不可測的變局將未必來自假想棋盤上的虛擬黑手，卻可能發自黨國長期代表著的人民。

實說，中國的茉莉花行動很虛擬，五週來沒看到些什麼。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的茉莉花效應「超真實」。五週來，每週都由當局的緊張反應定義了「茉莉花行動」的真實：密集部署的公安、城管，網上談花被捕，街頭散步遭拘留審訊，媒體記者受恫嚇……。春風之

5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美國會是輸家。Wallerstein, "The Second Arab Revolt: Winners and Loser" (2011/02/02), cited from <http://subprole.blogspot.de/2011/02/02/immanuel-wallerstein-the-second-arab-revolt-winners-and-losers/>.

6 《環球時報》社評〈讓世界「亂一下」，西方未必不想賭〉(2011/02/27)。引自：<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2/1525871.html>。

中免不了的花粉，稱不上細菌病毒，卻是否可能因過敏反應而釀成自體免疫風暴？畢竟，從虛擬到實現，從行雲到降雨，差別只在那麼個無從準確預測的觸發 / 驟成 / 凝結 (precipitation)。

北非中東的變局引起的熱情是世界的，而中國茉莉花的小氣候在世界的評論裡並非焦點，討論甚少。

四、茉莉茉莉向左開？

世界對茉莉花革命的熱情旁觀者裡有一方面的聲音是不該錯過的：西方左派，特別是激進反帝的評論意見。他們對世局向來有戰略分析的習性，雖然各自有不同的譜。比起西方當局的政治人物，他們傾向於守候或企盼著起事的政治主體出現，而一旦有事件發生，他們也更熱中於表達關注與評論。因此在感覺與詮釋世界變局的時候，他們是必要搜尋的一方智慧。然而，他們彼此之間是紛紜的，分殊的理論體系之下給出的洞察卻也可能有其盲點。他們揶揄西方自由派虛偽的尖酸，我們能同感快意，卻不會忽略他們自身可能的虛偽。

我們提過這一波世俗的民主革命粉碎了「文明衝突論」夾帶種族偏見的政治刻板認識：阿拉伯或穆斯林沒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能力，只會受到原教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動員，擺盪在世俗獨裁統治與狂熱神權統治之間。西方左派也抱持這般刻板認識嗎？或許未必，但是他們對於阿拉伯國家、伊朗、乃至中國在過去十年出現的公民社會「復興」(renaissance)，大致來說是忽略的。對於那些公民運動的異議人物遭到被迫去職或逮捕監禁的際遇，西方左派默不吭聲。紀傑克(Slavoj Žižek)坦承這是種虛偽，點出其邏輯：那些公民運動訴求的題目：分權制衡、民主正當性、對人權的法律保障等等，在西方左派看來不僅無聊而且可疑，因為那些訴求不夠反帝不夠反美。⁷

7 Slavoj Žižek, "From Democracy to Divine Violence," in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edited by Giorgio Agamben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這一篇雖也是2011年春出版的，但

紀傑克2月1日給了個評論：〈幹嘛害怕阿拉伯的革命精神？〉(Why Fear the Arab Revolutionary Spirit?)，揶揄西方自由派平時自詡支持民主不過是葉公好龍，真見到阿拉伯人民不為宗教卻為了世俗的自由與正義而起來反叛獨裁統治時竟然擔心起來。他好搬毛語錄，在結語時豪邁地搬了句：「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結果古怪的英譯(There is great chaos under heaven – the situation is excellent)⁸惹得許多困惑的讀者要求他把這什麼意思給說明白！紀傑克2月10日評論：埃及的事件有「奇蹟」的性質：沒人預料到，就這麼發生了。⁹沒人料到，不只是中東專家或是西方政客，他沒提及睿智的西方左派也沒人料到。他熱情地給予肯定：這一回起義有著普世性：比起1979年伊朗柯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革命那一回左派教義還得跟伊斯蘭框架勉強兜著，這一回起義，無須對埃及社會進行文化分析即可立即認同，那是普遍的世俗的籲求：自由、正義、尊嚴。至於獨裁政權的垮台，善用通俗文化題材的紀傑克給了一齣生動的比喻：像卡通《湯姆貓與傑瑞鼠》(Tom and Jerry)裡的湯姆貓為了追捕傑瑞鼠而衝出懸崖，牠還可以繼續衝一會兒不會墜落，因為牠還沒發現腳下是空的，一旦牠往下看看到了腳下是空的，是深淵，牠就摔下去了。威權統治者迫近危機時也有兩階段，先是政權失去了民心而凌虛蹈空卻還沒垮台。人民已經看到這場遊戲即將結束，也不再害怕，流失正當性的政權即便再濫施權力也被當作是無力的恐慌反應。就像湯姆貓，要牠跌落 / 垮台(to fall)，只消提醒牠看看腳下……。

紀傑克的老搭檔巴迪烏(Alain Badiou)在1月19日研討課上對突尼

書寫時間在北非事件爆發之前。我認為紀傑克有一點可取：他的挑釁沒有遮攔，包括暴露自己身屬的西方左派的虛偽。

- 8 Slavoj Žižek, "Why Fear the Arab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Western Liberal Reaction to the Uprisings in Egypt and Tunisia Frequently Shows Hypocrisy and Cynicism" (2011/02/01), cit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feb/01/egypt-tunisia-revolt?INTCMP=SRCH>.
- 9 Slavoj Žižek, "For Egypt, This is the Miracle of Tahrir Square: Here i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Either the Entire Mubarak Edifice Falls, Or the Uprising is Betrayed" (2011/02/10), cit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2011/feb/10/egypt-miracle-tahrir-square?INTCMP=SRCH>.

西亞情勢首度評論，開場時不忘尖酸嘲笑西方政客的虛偽。這評論稿一路發展增補到3月1日，六七個小節每一節竟都以毛語標題：**東風壓倒西風、造反有理、星火足以燎原、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¹⁰硬是把紀傑克搬弄毛典的鋒頭比了下去，也令人見識到毛崇拜40年不渝的執著。最初課堂講稿一個要點是：何以稱突尼西亞騷亂(riot)而不稱其為革命：

騷亂，撼動了國家權力，令其暴露在變革（例如當局垮台）的可能性中。但是騷亂並未能預示或具現變革。革命卻不同，因為有一套變革的綱領。這是何以騷亂起事者常會抱怨：新政權跟舊政權沒差。

稍後三月的稿子裡，巴迪烏的姿態刻意低調很多，他說「我們必須跟這些運動學習……因為是他們以創造的天才為那些當權者試圖讓我們以為過時作廢的政治原則賦予了生命」。他也承認這回人民起事的特徵是沒有革命政黨、沒有領導組織、沒有革命領袖。他說：「我們一時還不知道這是長處還是弱點。不過，這無疑是巴黎公社以來最純粹的形式，具備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所有必要的特質。『共產主義』的意思是：共同創造一個集體的命運」。

若你慶幸大師那麼包容的定義讓咱們一些「共同創造集體命運的行動」也榮譽地受認可為「共產主義」，那麼你將驚心在評論結語大師如何以高亢的嫌惡補充了限定條件：這回大規模起事的和平冷靜總被人們連結到選舉民主的理想，但是有青年犧牲成仁，有烈士！任何人能夠真心認為，在經過那麼殘酷的犧牲，這一場莊嚴的事件最終完成的目標竟然只是讓你能從張三或李四裡「選」一個，¹¹就如同在法國我們可憐地只能在薩科奇(Nicolas Sarkozy)跟史特勞斯罕(Dominique Strauss-Kahn)裡選一個？不！絕不！突尼西亞與埃及人民正在告訴我們：起來，為共產主義運動建起一個公共空間……這才是真正的人民

10 Alain Badiou, "Tunisia, Egypt, the Universal Reach of Popular Uprisings" (2011/03/01), cited from <http://marxistupdate.blogspot.com/2011/03/badiou-on-tunisia-egypt.html>.

11 他刻意的舉了惹人嫌的索雷曼(Souleiman)和巴拉迪(Mohammed M. El Baradei)來比方。

解放政治。

巴迪烏確實探得毛的真髓。向工農群眾學習！但這個必要的姿態下，你得知道必要的革命綱領在誰腹笥。政黨組織？沒有何嘗不可，必要時還得打爛！但絕不會沒有詮釋綱領宣告革命真理的小組或先鋒。巴迪烏自己的哲學也是，他的存有論是柏拉圖式的，有真理而且是普遍性的，那些掌握並宣告真理的是「militant」，他們是「真正的主體」，宣告福音、教導其他還不知道的人，必要時跟那些拒不知真理的人鬥爭。於是追求普遍主義卻終究免不了層級，至少是一分爲二：一邊是那些militant，真正的主體，另一邊是所有其他人。最早透徹瞭解這個邏輯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他在1873年目睹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崛起，在俄國革命之前44年預先給了關切的判斷：

那些腹笥有綱領的革命者(*doctrinal revolutionaries*)在推翻既有政府之後將在其廢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專制。他們永遠不會是國家(the State)的敵人，相反地，只會是國家權力最熱心的衛護者。因爲若不保留(國家機器)，那麼在真誠地解放了群眾之後，也會消滅了這個偽革命小群體企圖依其自身教條利用國家權力的夢想。¹²

實際存在過的(actually existed)列寧主義與毛主義的現實，同樣是巴迪烏的哲學毛主義未能排除甚至內含的可能性。這也解構了他想爲「革命」與「騷亂」劃異定價的企圖：新政權與舊政權有差沒差，怎麼差怎麼沒差？判準還真不在於有個掌握革命綱領的militant，使徒或先鋒。利比亞(Libya)強人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在遭遇人民起義反叛時的演講，不僅兩度喚起天安門事件爲自己暴力鎮壓人民作辯護令中國當局尷尬，更令人爲「繼續革命」理念感到難堪的是，已經獨裁42年的他堅持：**我才代表革命，我仍繼續領導革命。**

2011春季北非中東的事件，正好爲目前當紅的巴迪烏存有一政治—倫理體系的愛好者提供了絕佳的練習測驗：依照他的體系能夠如何區辨真事件與偽事件？無(void)的範疇，空集合 \emptyset ，在數學操作之

12 Michael Bakunin, *Statism and Anarc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 S. Shatz(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1873]), p. 137.

外的社會分析如何能是空的，不具任何內容？如何能夠判斷「真正的」政治主體與其他不真的、半真的主體，而且不落入一廂情願或是宗派主義自我滿足的劃分？相對於巴迪烏標榜的忠實主體(faithful subject)，他曾經評論過資產階級是反動的不真主體(untrue subject)、政治伊斯蘭是反動的蒙昧主體(obscurer subject)。¹³可以想見在北非中東事件裡呼喚共產主義運動的巴迪烏眼中，至少資產階級民主派與穆斯林兄弟會大概都已被歸為對立於忠實主體的不真或蒙昧主體，不算在「共同創造一個集體命運的行動」之內。

哈特與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2月24日給了篇評論：〈阿拉伯是民主的新先鋒〉¹⁴，認為橫掃北非中東的風雲不應該再被當作過去模式的重複，¹⁵而應被當作開啓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原創實驗，其相干性遠超乎一個地區。阿拉伯世界的這一輪鬥爭，在未來十年將如同拉美在過去十年，如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玻利維亞，會是強有力的社會運動與進步政府的政治實驗室。他們注意到了這一波抗爭的組織形勢，類似過去十年也發生在其他地區的樣態：橫向水平的連結，拒絕單一中央領導，一個有能力運用所掌握的社交網絡工具發動自主行動的年輕智慧型人口，哈特與奈格里很順當地用多年來描述他們所展望的政治主體的概念：諸衆(multitudes)來指稱，並期待他們能實驗出比傳統自由憲政的權力制衡與定期選舉更具創新內容的民主實驗。

不牽涉哲學理論體系，單純就回應北非中東情況的評論來說，我較能同感於哈特與奈格里對事件坦率開放的期待。不同於巴迪烏那種虛矯：一方面故示謙遜地聲稱要跟群眾學習，另一方面獨斷地指令什

13 Alberto Toscano, "The Bourgeois and the Islamist, or, The Other Subjects of Politics," in *The Praxis of Alain Badiou*, edited by P. Ashton et al. (Melbourne: re.Press, 2006), pp.339-366.

14 Michael Hardt & Antonia Negri, "Arabs are Democracy's New Pioneers", (2011/02/24), cit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feb/24/arabs-democracy-latin-america>.

15 這裡沒指名，但像是在跟那些總是在1871（巴黎公社）、1917（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脈絡裡評價所有政治繼起事件的某些左派對話。

麼才配稱為革命，怎麼才算真正的主體。另一點也重要：傳統自由憲政的權力制衡與定期選舉是不足夠的，期許民主內容的創新與實驗；卻不同於巴迪烏那種對選舉民主全然的鄙夷唾棄。我可以欣然同意巴迪烏：民主選舉出來的多是混蛋，薩科奇、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小布希(George W. Bush)……其實任何民主選舉出來的國家元首經常有近半數的人民天天罵他們混蛋庸才。但民主權利無非在於人們可以投票給他們想讓他上台的混蛋，或許兩個混蛋裡選一個，或許一個混蛋之後再選出個混蛋，只要能夠在憲政體制裡將他們選下台或是由制衡機制收拾他們，用不著槍桿子。這般民主權利無聊不值一顧嗎？不！若是給我一個令法國毛派大師崇拜四十年不渝，不世出的革命雄才，天縱英明的黨國領袖，換我這個不足道的民主權利，問我換不換？不換！

五、給我們的茉莉

茉莉花革命也是台灣應該感到歡迎的惕勵。沒有任何社會能夠自滿地宣稱已經享有民主的生活方式，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自詡已經完成民主的政治體制。民主，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語彙來形容，應該是恆久不息的修養與鍛鍊。未來十年阿拉伯在社會運動與進步政府的創新與實驗，也將值得台灣乃至華人社會的敏銳借鑑。

部分西方左派投射著歐洲左翼運動的挫折或鄉愁，描繪著近三十年來的趨勢：對民主的不滿日漸升高，選舉民主日趨末流，公民的被動冷漠在蔓延，去政治化或政治的撤退……。但研究歷史將發現，所有這些現象都並非晚近的趨勢，而向來是與民主同時代的。尤其是20世紀初普遍選舉權一開始，不信任、焦慮、幻滅、民粹的反國會政治、拒絕的政治，就都已經是民主的構成面向。¹⁶另一方面，描繪當代個人主義式地從公民生活撤出的印象也不盡然如實。我們仍見到社

16 Pierre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會運動與結社參與的活力、對於各種倡議群體的廣泛支持，未必見得民主失去了力量。選舉，政權透過嚴格程序取得具有法理性質的正當性，至今沒有最佳的替代方案，特別是相較於槍桿子出政權乃至欽定接班人的體制。選舉是必要而有力的公民參與形式，但只能是週期間歇性的。民主實踐需要恆常地對行政權力、國會、司法體系以及媒體分別形成獨立於黨派邏輯的警戒、監督、介入與拒絕的能力與機制。民主需要不斷地再政治化，卻沒有總體的教條或綱領。在日常社會互動裡可以重新發現深化社會正義的基進政治。而由作者與讀者構成書寫閱讀共同感受的公共空間仍然是政治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不僅是個工具，就其建立社群、創生社會連結、表現集體智力與意志而言，互聯網就是個社會形式，也是個監督與表達的政治形式。

茉莉花革命為世界也為我們帶來對民主新的感受、認知與理解。

2011/03/29於台中西屯